第 62 卷 第 6 期
2025 年 11 月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62, No. 6
Nov. 2025

学 术 探 源

论学术史、颖脱之文与中华文脉之关系

彭 玉 平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州 510275)

摘　要: 学术史是中华文脉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个学者除了需要直面研究对象,也需要面对比较丰厚的学术史,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两翼,不可偏废。关注学术史并裁断其高下,才能以此为契机建构自己稳固的认知和学术体系。对学术史的态度问题,不仅关涉方法,也关涉学风。要做主流的学术,成就“颖脱”之文,就应该努力将自己置于一脉相传的学术史中,用“犯之而后避之”的精神,造就有意义的学术人生,为赓续中华学术文脉而尽心尽力。

关键词: 中华文脉;学术史;颖脱之文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5)06-0161-11

“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①,是当下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路径与方法。我们要赓续的是绵延三千年的中华文脉,这是文脉也是根脉与血脉。要明辨中国文化之与世界的不同,要在世界学术文化之林发出强大的中国声音,建立强固的中国话语体系等,都与这条文脉有关,这是我们必须赓续的原因,也是必须赓续的动力所在。

所谓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指有一种强大的生命力、穿透力和影响力的文化,无论在怎样的时代,都能从这种文化中吸取养分,涵养一种新时代的精神与气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一种文化无论曾经是怎样的优秀,随着时代的变化,也都会有与新的时代不完全契合、不完全适应的成分,这才带来了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问题。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因子总是会因人因时因地而被激活,在被激活的同时,也吸纳了当代的文化,从而形成特定时代特定气象的新文化。所以,文脉要赓续,创新创造就不能停止;换句话来说,如果失去了创造和创新的动力,文脉也就无法真正赓续了。赓续的是不断被赋予活力的文脉,而不是从历史走来却一成不变的文脉。

在中华文脉中,自然包含着学术史脉。建立在学术史基础之上的学术传承与创新,才是有目的、有方向与有成效的传承和创新。如果把单一的研究对象比喻为一棵树的话,学术史就是这棵树背后的一座森林。一棵树的生态与一座森林的生态密切相关,一棵树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是无法离开森林而单独存在的,所以学术的“森林”意识是任何一个学者都必须正视、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换言之,不见森林的学术研究很可能失去了底蕴和方向,也无法从根本上界定其价值和意义。更言之,不关注学术史的研究,其实也是一种比较严重的学风问题。学术史与中华文脉有着天然而密切的关系。

一、何谓学术史“森林”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②。学术中国是文化中国的一个重要有

收稿日期:2025-05-20

作者简介:彭玉平,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① 习近平:《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人民日报》2023 年 10 月 9 日第 1 版。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49 页。

机部分,学术史的价值和地位,由此可以想见。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除了面对研究对象,还要面对学术史。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两翼,缺一不可。若比喻学术史的丰盛,“森林”一词或略近之,当然,森林也有大有小,有深不见谷底、远不见尽头者,也有稍作巡视,即可尽收眼中者。简言之,一旦明确了研究对象,要做的基础工作无非两步:其一认真细致阅读研究对象;其二深入全面了解学术史。埋首看经典,抬头看学术史,才能认清关注的问题是否真实,或者相关的问题尚存的学术空间到底在哪里。不知过往,焉知今日? 一个对学术史无感的学者,其成果的创新性本能地受到怀疑是有理由的。

所谓学术史,就是由对某一研究对象或领域的持续研究而形成的历史。学术史形态不一,或丰厚,或贫瘠;或多维,或单一。但无论是怎样的学术史都应该引起学者的高度关注。研究学术史与研究被关注对象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不注重或忽略学术史的研究,相关的学术研究很可能失去方向,相应的学术判断也很可能失去根基。

我们一旦把学术史与中华文脉结合起来,就意味着学术史并非只是停留在单一学术问题的抉发与梳理之上,而是与一个国家的历史意脉与时代精神息息相关。钱穆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除了梳理清三百年学术思想与业绩的发展轨迹,也致力于切合当世所存在之弊端提出见解,并寻绎学术史的新发展。梳理学术与裁断是否结合在一起,就使得他的学术史始终在理性审视的学术视野之中,欲以学术之新变传承中华文脉的宗旨十分清晰,这当然与钱穆此书撰于 1931—1937 这一段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故钱穆之文运实关系国运。这一层意思并不需要读者去细心勾勒,钱穆本人固已将这种意思真切地表述在自序之中:“是书所论,可谓近己矣。岂敢进退前人,自适己意? 亦将以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求以合之当世,备一家之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①“进退前人”或许只是过程,他承认撰写这部三百年来学术史是“近己”与“合之当世”结合之产物,并直言要承接司马迁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书写精神的使命。则其学术史中所包孕的时代精神,乃是不言而喻的。

昔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一篇论创作前后之关系云:“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②有古典作品的“不竭之源”,才有时代新声的“无穷之路”。刘勰在“通变”篇说 “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又说:“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拓衢路,置关键,长辔远驭,从容按节。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采如宛虹之奋鬐,光若长离之振翼,乃颖脱之文矣。”③刘勰已经较为完美地阐释了“双创”的路径、价值与意义。“颖脱之文”即脱颖而出之文,这才是文学创作的方向,是建立在前代作品“博览以精阅”的基础之上,“不博则师资不广,不精则去取不明,不博不精而好变古,必有陷泞之忧矣”④,有精博,才有文学创作“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的可能。

刘勰笔下的“文”如果理解为学术研究之文,则其理一也。“颖脱之文”也可以理解为一流的研究成果。钱穆说:“我们写学术史……要之必从我们自己源头上变下来。”⑤有源头也有新变,学术史的意义就在既“通”且“变”之中,若不能切合时代之义,便也失去学术史之部分意义,“双创”提出的学理意义,我认为正在于此。真学者应该有让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学术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追求,这是对学术抱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虽然个人的研究在学术史中的地位需留待他人或后人来衡诂,但撰就“颖脱”之学术成果,“望今制奇”“日新其业”是基本的学术宗旨,并以此参与学术史的建构是学术研究的一种基本意义。

---

①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4 页。

② 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081 页。

③ 《文心雕龙义证》(中),第 1098、1102 页。

④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34 页。

⑤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251 页。

不是每个学者都要去撰写专题学术史,但每个学者都必须了解、熟悉与自己研究领域相关学术史。陈陈相因,不知本来便也不知未来,这样的学术研究就是徒耗生命矣。面对学术史,我们大概会产生两种心态:一种心态是兴奋。兴奋的原因也大致有两种情形:其一是被丰厚而富饶的学术史所震撼而兴奋,已有的学术史给了我们大量有效有力的启迪,并可藉以建构自己的认知体系和理论体系;其二是被凌乱而浅薄的学术史所“震撼”而“兴奋”,因为学术史居然如此慷慨地为自己留下了大量空间。当然,还有一种心态便是失望,因为原本应被敬畏的学术,在不少人的笔下被任意扭曲、误解,尤其是那种因读书不足而仓促写下的文章,让人感叹学者这个群体,也真是鱼龙混杂。这一类文章虽然在学术史中几乎没有生命力,但客观上也扰乱了学术史的格局,毕竟澄清学术史也是一件费时费力的工作。

晚清民国词学是近年来受到关注度比较高的学术领域,王国维和况周颐便是其中的热门人物,相关的学术成果数量庞大,甚至多到惊人的地步。但如果全方位收集、沉浸式阅读这些中外学术史,其中具有创见或卓见,可以长留在学术史上的成果还是偏少;大量的成果水平一般,低层次重复现象相当突出,导致平庸乏味之作充斥其中。一部学术史,确实泥沙俱下,其中既有学术的清流,也有貌似学术的泥石流。学术可以有风向的转换,但漫长的学术史最终会过滤掉风向的因素,而沉淀为一种极为冷静甚至冷酷的求真学术清流。有志从事学术研究并介入学术史者,岂可不慎乎!

二、我们如何走进学术史

如果选择做一个学者,就要大致确立自己的研究领域或研究对象,也因此必然要有介入学术史的准备。或者说,选择了一个学术领域,其实就是选择了一种学术史。如果有学者在研究中罔顾学术史,甚至试图回避学术史,学术史也必然回避他,学术史是一种相当冷峻的历史。

在我的观念里,有一类文章价值偏低甚至没有多少意义的,就是那种与经典密切相关、已然有很丰厚的学术史,但其文章的注释或参考文献,却只有一个一个的原典出处,而无学术史的痕迹,或故意回避主要学术史。这不仅不符合学术规范,也是一种学风问题。这样的所谓研究大概率深度重复于学术史而不自知,甚至因为对学术史的茫然无知,而认为自己的研究“直接”经典,乃自家闭门实证悟得者,而衡诸学术史,则不免旧调重弹,甚至弹得还不如旧调好听。20 世纪 80 年代,钱锺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演讲,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足以引起不关注学术史者的注意。他说:

> 意大利有一句嘲笑人的惯语,说“他发明了雨伞”(ha inventato I’ombrello)。据说有那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土包子,一天在路上走,忽然下起小雨来了,他凑巧拿着一根棒和一方布,人急智生,把棒撑了布,遮住头顶,居然到家没有淋得像落汤鸡。他自我欣赏之余,也觉得对人类作出了贡献,应该公诸于世。他风闻城里有一个“发明品专利局”,就兴冲冲拿棍连布,赶进城去,到那局里报告和表演他的新发明。局里的职员听他说明来意,哈哈大笑,拿出一把雨伞来,让他看个仔细。①

钱锺书说这个故事的初衷或许只是自我调侃,面对成就斐然的日本学术界,自己是个不知深浅的“土包子”,但其所说情形颇与学术史相类。不了解已有发明,把“棒撑了布”便以为是自己的发明;同样,不了解学术史,往往把自以为是的“发现”——其实是陈陈相因的观点,当作真的创见一样,则在深度了解学术史的学者那里,闹出的笑话也就与此相似了。

与此相关,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常见的“重读”“重释”“重写”等颇有吸引力的口号。经典是在不断被阐释中产生强大的生命力;换言之,经典注定是要被反复阅读、诠释和书写的,经典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其具备难以穷尽的阐释空间,所以对重读重释重写,我们理当持一种宽容而开放的态度,并对相关可能的创新性成果充满期待,盖一时代对经典的阐释固有其新的方向。如新文化运动之时,若干健将对

---

① 钱锺书:《诗可以怨》,《七缀集》,北京: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115—116 页。

传统文化的拒斥以及对新文化的憧憬,都不免带着“救国保种”的历史期待和时代之责①。而当代的“双创”则为新时代融合古今的新文化服务。但重读重释重写的前提是得深度了解相关学术史的进展,了解哪些是已经明晰的背景,哪些是已经解决的问题,如此,才有可能知道原创空间在哪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真正路径在哪里。若不了解这些,或根本无意去了解,而只是自称“直接经典”,其实是另外一种意义上对经典的冒犯和不尊重。学术的意义从来就不是对相近或相同意思的频繁文字重组,而是在学术史基础上的不断开拓和创新。正如王国维对民国初年部分学人的批评所云:

> 损益前言以申己说,一也;字句偶符者引为塙据,而不顾篇章,不计全书之通,二也;务矜创获,坚持孤证,古训晦滞,蔑绝剖析,三也。必谫三陋,始可言考证。考证之学精,大则古义古制日以发明,次亦可以董理群书。②

王国维主要是从考证之发明以及董理群书角度指出了近世学人之敝。第一点批评有的学者只是从学术史中讨生活,不能走出学术史;第二点批评了断章取义而缺乏整本书阅读之精神;第三点是有创新之意识,但缺乏创新之能力。近年确有部分学者对重释经典情有独钟,有的期刊甚至专设“重写”专栏,对文学史、思想史与艺术史等,有组织地重新规划,以谋书写新篇,以张大学术之格局。这背后可能蕴含着学者或期刊的学术责任感与使命感,也可能在新的时代推进学术史的有序发展。

但既然面对的是经典,则其必然经受过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很可能积成规模,形成已然丰富的学术史认知体系。重写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树立起对学术史的挑战姿态,这对一个学者的学理修养与学术能力其实要求更高。但不可回避的是,有一些所谓的重释重读重写,对相关学术史所知甚少,个别的甚至茫无所知,只是凭着一点感觉和悟性把“冷饭”再炒一遍,读来恍然有倒退三十年的感觉。这样的文章即便一篇一篇写,书一本一本出,但在尘埃落定之后,在有心的后来人认真盘桓学术史之时,那些因为不关注学术史而导致学术史严重倒退的文章和著述,可能真的就只能安居在尘埃里了。

其实,拈出一个“重”字就意味着要站在当今学术史的更高处,以鸟瞰和无畏的姿态对待学术史。如果说连已有的学术史都不知深浅,那“重”写“重”释的方向在哪里呢? 不是换个人写就叫重写,或者换个时代写就叫重写,而是澄清谬说、创立新说、调整格局并大力推动学术史的发展,才是“重”字应有之义。对于从未被关注或极少被关注的研究对象,学术史疏阔一点甚至空白是可以理解的;而对于热门人物甚至一代之显学,若撇开学术史,这样的学术理念问题就比较严重了。所以对“重写”的口号理当慎重提出并怀有警惕。只有天赋极高且极勤奋的人,才有可能掀开学术史的新篇章;若一个连对相关学术史都缺乏主动了解的人,如何能推动学术史的创新性发展呢!

读学术史与读原典应该是一个彼此绾合的过程。就阅读顺序而言,第一步当粗读原典,第二步边细读原典,边细读学术史。先粗读原典的目的是求一个大致的整体了解,而细读原典则是求一种精确而深度的解读。一旦进入到细读的环节,问题就可能扑面而来,这时就必须同时面对学术史了,因为要界定问题的真伪与大小,只有衡诸学术史才能得到精确的答案。从原典读出的问题与从学术史读出的问题,在斟酌、比较之下,才能真正汇合成一个一个确然成立的论题。清人江湜《由常山至开化折回江山凡山行四日共录绝句二十首》其一云:“我要寻诗定是痴,诗来寻我却难辞。今朝又被诗寻著,满眼溪山独去时。”③好的诗歌是自己找上门来的,好的论题也是在读书过程中自然形成的。

读原典的前提是把读原典与学术史变成一种生活习惯,这是从事学术的基本前提。有的人不想读书,却想写文章,或者不想多读书,却想写好文章,这怎么可能呢? 黄庭坚说自己三日不读书,则觉面目

① 钱穆:《国学概论》(下),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3 年版,第 355 页。

② 费行简:《观堂先生别传》引,王高明等编:《王忠悫公哀挽录》,天津罗氏贻安堂 1927 年刻本。

③ 江湜著,左鹏军校点:《伏敔堂诗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73 页。

可憎①;还有人说三日不读诗则觉口臭②。不读书不仅面目可憎,文章也必然可憎的。梁启超说:“我们读书,并不是想专向现时所读这一本书里头现钱现货的得多少报酬,最要紧的是涵养好读书的习惯和磨炼出善读书的脑力。”③读书与作文不一定直接相关,但读书读多了,脑力提升了,岂有不能作文之理。这也就是王国维说的“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④的读书作文之法,不是为了作文去读书,而是从读书中自然读出文章意趣来。

阅读学术史,有时也能从中直接催生出新的研究成果,并成就学术史的新篇章。有两篇文章在笔者的学术生涯中带有特殊性:一篇是《关于〈殷虚书契考释〉的一桩公案》⑤;一篇是《关于〈静安文集〉的一桩公案》⑥。这两篇文章尤其第一篇就是典型的“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的结果。笔者对甲骨文至今也完全是外行,《殷虚书契考释》这本书虽然长存在我的书架上,但也一直没去通读过。因为阅读了大量有关王国维、罗振玉的文献,遂能清晰了解关于此书作者之争的来龙去脉,也就是说,从学术史中就直接读出这篇关于甲骨文著作学术史的专论。因为不需要深度进入甲骨文的专业世界,也不需要对甲骨文的读解作出学术判断,只要将阅见的相关材料绾合成章便可。这样的文章自然不可能先有作文之想,再去读相关文献的。《关于〈静安文集〉的一桩公案》一文的情况也与此类似,不少文章对于王国维在日本京都永观堂是否曾摧烧三百本《静安文集》约略涉及,但两说并存,令人无所适从。其实全面阅读歧说之由来,相关学术史事实俱在,其中并无令人生出疑窦的空间。凡此,都是从学术史中读出的新文章。

大凡读书宜先求广再求深。如欲研究况周颐之词学,不仅要读《香海棠馆词话》《餐樱庑词话》《蕙风词话》《历代词人考略》等词学著作,也要读他的《选巷丛谭》《兰云菱梦楼笔记》《蕙风簃随笔》《蕙风簃二笔》《香东漫笔》《眉庐丛话》《餐樱庑随笔》等笔记杂谈,否则,其中若干要眇幽深之义,便容易茫无头绪,无处安顿。因为相关之书,各有生发,汇合来看,更见气象,更有格局,也更容易探及底蕴。

研究王国维的词学,当然要读《人间词话》,但也要读《文学小言》《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词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甲乙稿》《履霜词》《壬癸集》《壬子三诗》等。因为他相关的词学活动和著述是彼此关联的,失一隅便难窥全豹。读书有格局,思想才能有格局,文章也才能跟着有格局,这就是读书广的意义所在。当然这里的“广”还是有所限定的,漫无边际的读书只能作为纯粹的消遣,而学术研究总是有一个相对恒定的范围,至少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或在若即若离之间的书籍,若能尽量浏览,想来阅读的种种感受终究会集聚到一个较为明确的方向的。

学术确实是既朴实又老实的事情,一点也不容玩弄花架子,大发明往往自沉潜经典中来。若没有玩味原典之功,则难免受不得要义之讥。王闿运抄《方言》《左传》《礼记》诸书,一书抄成,往往积百日以上,所谓沉潜含玩,抄书亦其中一义也。这就是读书的深与细,没有这种功夫,也难求学术的精与大了。王闿运的治学理念十分朴实,读《湘绮楼日记》,因知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古典学者,基本功大体建立在三者之上:一曰抄书;二曰点读;三曰含玩经典论著。如此,勤勉之功方得彰显,路头端正,才能走向光明之学术。

而衡量一个古典学者之学术格局亦有三者:一曰注书;二曰选本;三曰著述。盖注疏一种书,不唯需要精读,用力自深,抑且留住自家田地。当然所注之书,应具有经典意味,此正如朱熹所说:“天下更有

① “黄山谷尝云:‘士大夫三日不读书,自觉语言无味,对镜亦面目可憎。’”参见陈继儒:《岩栖幽事》,明宝颜堂秘笈本,不分卷。

② 《太平广记》卷一九八引《谈薮》曰:“梁高祖重陈郡谢朓诗,常曰:‘不读谢诗三日,觉口臭。’”参见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1483 页。

③ 梁启超《治国学杂话》,《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243 页。

④ 姚名达《哀余断忆》,《王国维全集》第 20 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17 页。

⑤ 《中州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6 期,第 198—205 页。

⑥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1 期,第 71—81 页。

大江大河,不可守个土窟子,谓水专在是。”①所注之书,若果然具有大江大河的品质,则学境自然因此而大开;编一种选本,乃明一种文体源流,或一时期文学之大观,可见史家之眼光与通观之精神;著书立说,则见精识之心与裁断之力。今日文学史家多忽视前二者,倾力于专著;而文献学家复偏嗜前两者。学术之失衡,往往如此。今再三思湘绮翁之论,深感其真乃善学善思者也。简而言之,文献与理论乃必须兼顾,方能成就学术之格局和气象。而通贯注书、选本与著述中,原典之外,就是学术史了。注书之中,必然要斟酌前人之注疏,著述也是在学术史基础之上才能成就高境。学术史对学术研究的支撑是全方位的,学术史的脉络清晰,中华文脉的脉络自然也得以彰显。

三、我们如何走出学术史

文化自信的根底来自文化的主体性,“面对近代以来的剧烈社会变迁,中华民族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在艰辛守护和不懈探索中赓续中华文脉,巩固我们的文化主体性”②。学术史脉的主体性,就是学者的自主创新,以往的学术史只是为后来者的创新提供历史经验和突破路径。所以,走进学术史并非最终目的,而是研究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环节而已。简单来说,了解学术史已经关注并解决的问题与尚存留的问题,是为了展开自己更有针对性的研究工作。如果形象地说,学术史起初或许是学者眼前的高山,而终究其将成为其垫脚石,提升其眼界,使其越过尘杂的芜漫、摆脱荆棘的羁绊,直接从一个更高的平台来推进学术史的发展,从而另立自己的学术境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③这大体是从文学创作角度来说的,移之以论学术史,似亦可通。对于学术史,首先是全面地了解,然后在有所选择的基础上,走出学术史,开辟自己的学术领域。因为了解学术史,所以推进、提升学术史的方向明确;因为跳出学术史,所以自我开辟的学术空间鲜活灵动。

对于学术史,合理地采择是基本前提。简单来说,对于已有的高水平的学术史,要尽量吸收,中等水平的学术史则须谨慎选择,而对低水平、无意义的学术成果,则基本可以弃之。此意不仅对学术史当如此,对一切需要借鉴、学习的对象,所持立场应大体相同。唐太宗在《帝范》卷四中说:“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④这应该是从治国方略的角度来说的。宋末严羽《沧浪诗话》中论学诗之法也说:

> 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⑤

这一节话谈的是“学诗者”,但“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作为一种法则,却不限于学诗,对于学术史的态度同样如此。以“识”为前提,关注高水平学术,就是一种“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若眼界不高,不辨精粗,就只能愈趋愈下了。若丰厚的学术史在前,研究者不识轻重,缺乏基本的鉴别能力,学术史也就徒增其乱了。曾在某期刊偶然读到有学者去商榷一篇毫无创见、谬误百出的文章,这就是识见低下的一种表现了。这就好像久已是学术史中的一件废弃之物,却又捡起来,再去论证一下它被废弃的原因,这实在是一件毫无意义的工作。

---

①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44页。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第45页。
③ 彭玉平:《人间词话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04页。
④ 吴云、冀宇编辑校注:《唐太宗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5页。
⑤ 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大凡丰富的学术史总有上佳、中等与下劣之分。上等的学术史可以借以构建自己的认知体系,中等的学术史在商榷中取其精义,下等的学术史只是用来了解学术史曾有的黯淡区域而已。只有精粹的学术史,才能打开后来者的眼界,才能由此出发开拓出更广阔更高端的学术世界。所以先具识力,才能选择,也才能有效走出学术史。否则困在学术史中,罔识东西,学术史不仅不能成为学术之助,反成学术之泥淖也。中华文脉中的学术史脉,要赓续的是卓有识见、自成体系的学术史。

四、如何介入已成热门或显学的学术领域

热门的学术领域,更能彰显文化与学术的主体性。在晚清民国词学领域中,王国维与况周颐都是炙手可热的人物,而王国维的热度尤高,堪称显学,要强力介入其学,其难度可知。但如果系统阅读大量学术史,则确实颇多令人困惑甚至深感遗憾之处,王国维研究中创见与陋见几乎形成对峙的局面。对可观的创见,我们当然要抱有绝对的敬意;而对大量的陋见,则心情可能难以平静,因为这些陋见不仅扰乱了学术史,甚至是学术史的一种倒退。所谓的“学术”一旦到了这样的境地,恐怕已难当“学术”之名了。

我在这里不展开说创见,当然也不岔开说陋见,而是对王国维研究中的相关内容略说一二。

在文学研究领域,关于《人间词话》的研究甚多,专著不下十种,相关的文章更是汗牛充栋,难以尽数。但这些研究高度集中在对《国粹学报》发表本《人间词话》的研究上,而作为最初一念之本心的《人间词话》手稿,以及作为终极版本的《盛京时报》再刊本,则呈现出相当一致的冷漠态度。这是不是学术史慷慨留下的学术空间?相对手稿和终稿,作为过程状态的《国粹学报》本,虽有价值,但也只是具有阶段性的价值而已。若将王国维的词学成就全部定位在这个本子上,则不仅前此源流难以追溯,后之方向也无法落到尽头,恐怕令王国维也难以心安的。

王国维的词学与他的诗学、词集目录之学、创作都有很密切的关系。检学术史,对王国维《文学小言》《词录》《人间词甲乙稿》等的研究文章仅有寥寥数篇而已,而且大率以介绍为主,对其与《人间词话》的关系少人问津。这是王国维的词学背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是不是也是学术史的慷慨遗留?

此外王国维虽是学术热点人物,但也有不少有价值甚至很重要的冷门领域完全在学术视野之外者,这是填补空白的工作,也是丰富学术格局的需要。王国维的词集如《履霜词》至今也只有一篇专论①,至其在日本京都编纂的《壬子三诗》《壬癸集》在编成百余年中竟无一文关注,此甚可异也。其实这两种诗集,不仅在王国维的思想和情感上具有特殊的转型意义,而且在艺术上也发生了不少重要的变化,其价值无待扬榷而自然存焉。再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虽已经影印出版,但原本附录其后的《静安藏书目》却未被同时出版,其实这个书目对于了解王国维早期的思想与学术来源显然具有指引意义。以上这些学术史遗存给后来者提供了相当充足的思考空间。

有关况周颐的情况与此亦类似。学界对其词学的研究基本上集中在《蕙风词话》一书,而关于此书的研究,有关“重拙大”的专论又占了七成以上。先暂且不评说有关“重拙大”研究成果的水平高低,认真通读细读过《蕙风词话》的人,料会有许多困惑:如从 1904 年况周颐的第一部词话《香海棠馆词话》发表,一直到 1924 年整合诸多词话并加上若干临时撰写条目而成之《蕙风词话》,在这长达 20 年的时间中,况周颐对“重拙大”说居然没有任何推进、丰富和完善,各本呈现的都是似曾相识的几句,这应该不符合一种理论学说随着阅历增长而必然有所变化的规律。而在今存托名刘承幹撰的《历代词人考略》中,无论是在他以“作者”身份写下的小传还是按语中,竟然再无一例并说“重拙大”者,这不是很奇怪吗?若况周颐果然极端信奉“重拙大”说,何以在托名的著作中,居然整体消失无踪?而我们回看“重拙大”说的来源,似乎就更能说明问题:

---

① 彭玉平:《抄本〈人间词〉〈履霜词〉考论》,《文学遗产》2013 年第 6 期,第 126—138 页。

> 己丑薄游京师,与半塘共晨夕。半塘于词夙尚体格,于余词多所规诫,又以所刻宋元人词属为斠雠,余自是得窥词学门径。所谓"重拙大",所谓"自然从追琢中出",即心领神会之,而体格为之一变。半塘亟奖藉之,而其他无责焉。①

况周颐又云:

> 戊子入都后,获睹古今名作,复就正子畴、鹤巢、幼遐三前辈,寝馈其间者五年始决。②

从况周颐的自述来看,"重拙大"乃是王鹏运刻意传授给况周颐的"外来"学说,并非况周颐最初一念之本心。经过长达五年的斟酌思考,况周颐才决定接受这一学说。况周颐入京前所作词多流于侧艳,王鹏运惊其天赋词心,乃不可多得之才,因竭力导其正轨,以"体格"相规诫,而"重拙大"云云正是在"体格"之下的总体审美规范。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本心的审美追求与外在的审美要求之间,能完美协调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而在两者不一致的情况下,矛盾的理论格局必然会时时出现。这大概就是我们在细读《蕙风词话》时,感到况周颐时有斜出旁逸之论的原因所在。最突出的如"松秀"之说,况周颐以此来评述词人词作之例甚多,而细绎"松秀"之内涵,其实与"重拙大"说不仅不和谐,甚至有对立的地方。再如"清疏"的概念在《蕙风词话》中也偶露峥嵘,而在托名刘承幹的《历代词人考略》中,"清疏"一词简直是络绎奔会在况周颐笔端。何以一边是"重拙大"说的整体缺席,一边却是"清疏"说的强势登场呢?其中至少可见况周颐词学形态的复杂性,断非一个"重拙大"说可以涵括其整体风貌。如果淡化"重拙大"说与"松秀""清疏"之说的对立,则以"明流""暗流"来比喻其间的表述方式,大概是合适的。细读文本和学术史,学术史留下的问题不仅很多,而且从这一论题,正可见晚清民国时期对于小词与国家命运的关系,在王鹏运、况周颐的词学思想中,以当代眼光赓续文脉的意思是十分显豁的,而王国维的"当代眼光"则又与况周颐等形成了差异。简单来说,这一时期词学明流与暗流的结合,便是清末民初文化学术之脉的时代特征所在,因为新旧词学的碰撞与对峙在这一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和强烈。

五、学术研究的"犯"与"避"

面对丰厚的学术史,除了自暴自弃式的学术玩票,我们不可能真的能绕道而行,尤其是学术的主体问题,若刻意回避,则等乎将学术的主体弃置一旁。不能行走在学术的主干道上,谈何主流学术呢?金圣叹在《水浒传》第十一回总评中说过的一段话:

> 夫才子之文,则岂惟不避而已,又必于本不相犯之处,特特故自犯之,而后从而避之。此无他,亦以文章家之有避之一诀,非以教人避也,正以教人犯也。犯之而后避之,故避有所避也。若不能犯之而但欲避之,然则避何所避乎哉?是故行文非能避之难,实能犯之难也……将欲避之,必先犯之。③

金圣叹主要评述的是《水浒传》中人物形象、情节与场景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问题。其实,面对学术史,研究者的心态也同样有这样的情形。大凡热门学术,主干问题必然会被反复关注,若因为关注者众多而故意回避,就遑论建构自己的论说体系了,因为主干学术问题的缺席,相关研究体系就难称稳健了。所以,一味的"避"看似容易,却容易把学术引向偏门,相关的学术贡献也就不可能是主体意义的。如果只能在某个学术领域做一点边角料的补充或发明,价值虽然也有,但显然就极为有限了。所以"犯之而后避之"不仅体现出一个学者的胸襟、勇气和魄力,也体现出学术的主体、格局和境界。

关于王国维,有几个问题大约是必须"犯"的,如境界、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隔与不隔等。这些问

① 徐珂:《近词丛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27页。

② 况周颐:《存悔词序》,况周颐著,秦玮鸿校注:《况周颐词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32页。

③ 施耐庵著,金圣叹评,刘一舟校点《水浒传》,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231页。

题如果简单回避了,则研究王国维词学就只能徘徊在边缘了。但“犯”也是有风险的,若“隔与不隔”说,相关的研究其实已经解决了不少问题,整体的研究是值得肯定的,但对“隔与不隔”的形态特征还是缺乏关注。细读王国维文本,王国维在三种版本的《人间词话》中虽然也不断有语言的斟酌调整,但并非在“隔”与“不隔”的两端立论。读《静安文集》即可见王国维的论证逻辑往往悬两极而取中间,绝对的“隔”其实难当“文学”之义,绝对的“不隔”也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而已,故在他的理论话语中最有现实意义的其实是“隔之不隔”与“不隔之隔”两种形态。换言之,一诗一词之中,更常见的其实是“隔”与“不隔”的错综与搭配而已。

再比如“境界”说,相关的研究文章数量简直可以用“惊人”二字来形容,即从溯源角度而言,就有从宗教、诗学、哲学以及西学等方面追寻的。但我一直觉得这些当然可以作为“境界”说的溯源,但却不能直接说是王国维“境界”说的源头。若王国维未曾浸润于此,再丰厚的源头也是他隔膜甚至是难以承受的。所以若不能精准有度地落实到具体的作者身上,这种看似渊深而广博的溯源就不免显得汗漫甚至恣肆了。至于对“境界”说内涵的分析,或许各有偏至,但集合来看,胜义殆亦差尽。但如果认真通读最新版 20 卷本的《王国维全集》,也许留出来的学术论题就不期而至了。

1901 年 4 月王国维翻译《日本地理志》,此书“总论第一”,第一节是“位置”,第二节便是“境界”,王国维在“境界”之下的译文是:

> 东临太平洋。西南隔中国海,遥对中国本部。西北依窄狭之日本海,与朝鲜、满洲及俄属地相对。北端临北海道之宗谷海峡、千岛之久留里海峡、密迩俄属桦太岛(即库页)及堪察加。①

从译文内容来看,“境界”的概念显然就是“境之界”的意思,分指国土在东南西北不同方向的边界所在,这分明是一个地理学的概念。同样是 1901 年,王国维还翻译了一本《算术条目及教授法》,王国维的译文说:

> 欲确定算术即日本算术,不可不先确定者:第一,算术与代数之境界;第二,算术中整数之性质篇与整数论之境界。但兹所谓境界者,非争分寸之境界,而谓相重复之小部分之境界之意也。②

在第二编“各论”中,他也有译文说:

> 观德国之谚:凡入于不知之境界而自失者,谓之陷于分数,则教授分数之难可知。③

这些当然不是王国维原创之语,但这些话语既曾经过王国维翻译,则“境界”一词进入王国维的认知体系,自然可视为从这里开始。从译文来看,此处的“境界”具体指算术与代数彼此交叉的知识范围而已,显然非指具象的地理学概念了。则日语语境中的“境界”才应该是对王国维起直接作用者。当然,1904 年初,王国维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中提及的“境界”已经有了审美的高度和状态的意义了。这一王国维“境界”说的内在源流尚未被学术界重视过,这些“境界”用例,都是王国维直接使用过的,其可贵在此;若论及王国维“境界”说的源流,这一从地理学到知识范围再到审美状态的过程,显然更契合王国维的本来之思。

关于况周颐词学的研究,如果说论其“松秀”“清疏”是“避”的话,直面“重拙大”说就属于“犯”了。但如何“犯之而后避之”呢?若既犯之而不能避之,则大概率流于重复,相关的文章不作也罢。在《蕙风词话》中,况周颐对“重”的内涵阐释最多,对“拙”的阐释次之,学术史对此二者的解读大体已经相当充实而饱满。而关于“大”,夏敬观说“况氏但解重、拙二字,不申言大字”④,固然未细审况著,但检诸学术

---

① 王国维:《日本地理志》,《王国维全集》第 16 卷,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41 页。

② 王国维:《算术条目及教授法》,《王国维全集》第 16 卷,第 437 页。

③ 王国维:《算术条目及教授法》,《王国维全集》第 16 卷,第 475 页。

④ 夏敬观:《蕙风词话诠评》,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五册,第 4585 页。

史,“大”之释义确实尚歧义纷出。万云骏、方智范、杨柏岭、杨保国、孙克强、朱惠国、曾大兴诸文①,对“大”的含义便各有其立场,其中更有意思相近者。但检以上诸文所持之材料,则总体仍有一定的意义扩展空间,因为一种理论固然可以覆盖一定的范围,但不应呈现出如此发散的状态。

夏敬观说况周颐未申言“大”字,显然失之草率,况周颐只是申言得比较零散,一枝一节散落各处,未能在形式上凝合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学说而已。若果然对《蕙风词话》一字一句读过,就能发现诸多况周颐以“大”评词之例,或侧重在情感意趣的开放性②,或侧重时空的延展性③,或指称将个性、天性、自我情感张扬到极致的一种状态④。合诸上述种种,况周颐不仅诠释了“大”,而且将散漫数处的评语绾合来看,其实包含着自我之极致性、开放之延展性、整体性。

如果以上对“大”诠释大体可以成立,则在“重拙大”三者中,真正与“南渡诸贤”词风相近的则仅有一“重”字,而“拙”与“大”则时或疏离,有时甚至更关合北宋的词风。这是王鹏运当年的理论指点本身就有问题,还是况周颐在阐释时偏离了王鹏运的方向? 似皆可以深长思之。但客观地说,深蕴在《蕙风词话》中的理论确实义出多端,彼此难以协调的地方所在多有。这正是源于“重拙大”对于况周颐来说,乃是“外来”学说的缘故。为示尊奉师道,他虽然在各本词话中都特别标出以为旗帜,但其实其与本心的矛盾乃是天然存在,并且难以透彻融通的。明乎此,试图与学术史上诸家解读“重拙大”说既“犯”且“避”的地方似乎就隐约出现了。从本质上来说,学术史只有起点,而无终点。学术史的“犯”“避”之妙,也正体现在这一过程中了。对主体学术问题“犯之而后避之”,才能推动学术史脉的有序发展,才能彰显学术史之荦荦大端。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历久弥新,就在于永不放弃的突围和创造精神。学术史当然也要在犯与避之间,寻找到自己的创新之路。

六、中华文脉与学术史的现代力量

赓续、创造创新、转化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绾合传统与当代、文脉与承传就是当代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习近平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也就是与中国文化的根脉结合起来。“这‘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并由此巩固我们的文化主体性。⑤ 作为文脉之一的学术史脉,同样面临着学术主体性这一问题。无论学术史是一座高山,还是一潭浑水;是起伏的丘陵,还是蜿蜒的溪流,都是学术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都需要后来者以高明之“识”来裁断高低,合理采择。精准有度地处理学术史,不仅是一个优秀学者的基本素质,也是自身学术发展的重要基础。而将自身的研究同样有效地融入学术史中去,则是学者应有的自觉追求。我们从学术史中走来,并努力行走在学术史中,如果最后能把自己的身影留在学术史上,则堪称是一种有意义的学术人生。后人在检索学术史时,即便我们不能大发光芒,位居学术史的“高端”部分,但至少不要停留在黯淡的区域,成为一种被鄙视的对象,这是最低的意义限度。唯有如此,我们的学术之心才是安稳的。

---

① 万云骏:《〈蕙风词话〉论词的鉴赏和创作及其承前启后的关系》,《文学遗产》1984 年第 3 期,第 95 页;方智范等:《中国词学批评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91—394 页;杨柏岭:《晚清民初词学思想建构》,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39 页;杨保国:《〈蕙风词话〉“重拙大”理论新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 年第 3 期,第 154 页;孙克强:《清代词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55 页;朱惠国:《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60—261 页;曾大兴:《况周颐〈蕙风词话〉的得与失》,《文艺研究》2008 年第 5 期,第 56 页。

② 况周颐:《蕙风词话补编》卷一,屈兴国:《蕙风词话辑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06 页。

③ 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 4466 页。

④ 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 4422 页。

⑤ 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第 32—33 页。

中华文脉需要的正是不断走向精粹、阔大而有格局的学术史。学术研究看似可以分解为一个个具体的问题或领域,但这些问题与领域的学术史汇合起来,就是中华文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我们勘察王国维、况周颐的词学及其相关学术史,就能看到词学学术史在清末民初这一特殊时期旧词学之结穴与新词学之启蒙的过渡与结合,这同时也是中国政治体制从封建走向共和的重要时期,学科学术的现代形态也是在这一政治体制下逐步建立起来。相对于创作才华、情感与思想的融合而成的精品力作,学术研究所带来的判断力不仅可以从理性的角度补偏救弊,指引创作的方向,而且对未来创作与学术发展,也是一种重要启迪。优秀的学术史前后相继,才能铸就优秀的文化史脉。

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从来就是在勘察学术史中识其不足并开启新学。即如春秋战国之时诸子之学兴,“本为在下者以学术争政治。而其衰,则为在上者以政治争学术”①。在下者与在上者虽然路径或有不一,但都行走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则是一致的。中国文脉也往往就是政脉与国脉,或彼此共消长。文脉是中国文化的根脉与血脉,这种根脉与血脉推动着文脉的发展,但中华文明在传承文脉的同时,更需要现代的学术力量。清晰而裁断有力的学术史与颖脱卓异的学术成果,都是现代文明建设十分需要的,是从历史中来,而在现实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和力量。只有深厚的文脉在传承与转化中带来新的文化力量,才能带来文化自信。而以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成果和学术成果助力中国当代的新文化建设,才能造就未来扎实而可信的学术史。如此来看,看似单一的学术研究或学术史,其背后依托的正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未来的文化图景,则学术之道岂不大哉!

On the Interplay of Academic History, Works of Pioneering Brilliance, and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Peng Yup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e core conten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consists of the continuation,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Academic history forms an organic component part of this tradition, serving as one of the twin pillars of scholarly inquiry. A scholar must therefore confront himself with both research subjects and well-established academic tradition, neglecting neither of the two. Only through rigorous analysis of academic history, can the scholar develop robust intellectual and academic systems. This dual engagement reflects both methodological rigor and scholarly integrity. To produce works of pioneering brilliance (颖脱之文) and contribute to mainstream scholarship, the scholar must ground himself in the lineage of academic history while embracing the spirit of “confronting and then transcending” (犯之而后避之) to forge a meaningful academic career, thereby perpetuating the legacy of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Key words: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academic history; works of pioneering brilliance

(责任编辑　郑　园)

① 钱穆:《国学概论》(上),第 65 页。